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

——深切怀念恩师黄枬森教授

赵 家 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摇摇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黄枬森老师的《哲学的足迹》一书,这本书精辟地叙述了黄老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历程和轨迹。我作为受黄老师教导和指导最多的学生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方面是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的。

一

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1959 级的本科生。正是在这一年,黄老师被调到哲学系编译资料室工作。期间,他组织一些熟悉外语的学者编写了列宁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的注释。1962 年,黄老师给我们年级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这是他第一次讲授这本书,我们年级的同学是幸运的,内部铅印的《〈哲学笔记〉注释》作为讲义发给学生。《哲学笔记》中摘录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段落非常难懂,黄老师用引读的方式一句一句地给学生讲解,使我们懂得了黑格尔抽象晦涩而又颇为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列宁对黑格尔思想的评注和发挥。我是这门课的课代表,与黄老师直接接触较多。黄老师渊博的学识、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蔼可亲的待人风格,深深地感动了我。在学习期间,我还选修了张世英先生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和齐良骥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黄老师对《哲学笔记》的讲授,对我学习黑格尔这两本书有很大帮助。所以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列宁对黑格尔的批判和改造”这个题目,由黄老师做我的指导教师。经过听黄老师的课和黄老师对我写作毕业论文的精心指导,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感兴趣,立志毕业后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64 年毕业时,我和赵常林、金海民三人被留在正在筹建中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当时只知道洪谦教授任所长,尚不知还有哪些其他成员。由于我们毕业后就去搞“四清”,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外国哲学研究所在 70 年代初才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我更喜欢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 1972 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哲学系工作时,就向系领导申请不去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选择了去当时由孙伯揆老师负责的“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教学组工作。在“文革”后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以后,我被分配到这个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黄老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教研室,但教学和研究的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我就走上了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的道路。

二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开展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黄老师,以其学术的敏感性,充分意识到了这个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经系领导研究决定在 1983 年 3 月由我系举办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全国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系领导动员教师撰写论文,为会议的召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我撰写了一篇题为《异化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长达 22000 学的论文,主要论述和评价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这篇论文收入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的论文集中,会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讨论会期间,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邵铁真同志,通过理论部编辑李景瑞同志与我联系,要求我把这篇长文压缩成 9000

字左右的论文，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这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教师的我来说，是一件在学术生涯中极其兴奋的事情，我很快就完成了压缩和修改的任务，该文于 1983 年 4 月 23 日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上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文章所持观点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同。1983 年 4 月，我系又举办了一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与 3 月份的讨论会同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我为会议提供了一篇题为《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长达 25000 字的论文，该文收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辑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研究》的论文集中，该论文集于 1985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提供给两次讨论会的这两篇论文，是我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中取得的较为重大的成果。没有黄老师的引导，我在当时是不可能写出这两篇论文的。

三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深受黄老师的影响，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和研究中，采用的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教科书到教科书的方式，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到论从著出、论从史出。所以我虽然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和研究，但对马列哲学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比较熟悉，并且写了一些史、论、著结合的论文和专著。黄老师出版的《〈哲学笔记〉注释》、《〈哲学笔记〉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八卷本、一卷本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著、教材我都认真学习过。2004 年，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7 年我被中宣部工程办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组的首席专家（召集人）。我作为一个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和研究的教师，能担当起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的重担，也得益于黄老师多年的教导所打下的基础。而且在编写过程中，我又更加细致认真地学习了黄老师和其他学者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材和专著。这本教材于 2012 年 5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撰写了本书的绪论和第四、五两章，并做了统稿、定稿工作。没有黄老师及其他先辈和同辈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作基础，我和我们课题组的同人是很难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这可看做是我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取得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四

黄老师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建和创新工作，发表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在我国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1 世纪初，黄老师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与创新研究”课题。该课题于 2002 年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立项，后又得到北京市社科联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黄老师也吸收我为这个课题组的成员，参加这个课题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构建》这部专著的写作。黄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一总五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可以看做是总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人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五个部门哲学或五个分论。黄老师分配我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篇。我参加这个课题组最深刻的体会是黄老师在学术观点上的坚定性和包容性的统一。黄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其体系是“一总五分”，这是黄老师坚定不移的一贯的观点。他对不同的观点既据理驳斥，对持不同观点的同人又十分友善，从不因为观点不同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从不在学术讨论、争论中“唯我独马”、出语伤人、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我对黄老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几个看法并不完全赞同。如黄老师把历史观作为部门哲学，把它排除在世界观之外，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没有历史观的世界观就只剩下自然观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理解为仅仅是自然观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马克思是把“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统一在一起的，是把自然

观和历史观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应该既包括自然观又包括历史观,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我与黄老师私下表达过我的这种看法。但黄老师并没有因此而不让我参加这个课题组,他仍然对我的观点持包容态度,让我撰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一篇。当然,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十分注意,尽最大的努力不写与黄老师不同的观点。我借黄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在这一篇中写进了我的一些近期研究成果,使我以前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有了一些新的面貌。这是我沿着黄老师“哲学的足迹”行进取得的又一成果。

黄老师离开了我们,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大损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对黄老师的辞世感到万分悲痛。我要化悲痛为力量,以有生之年继承黄老师的未竟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尽绵薄之力。黄老师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黄枬森先生与《北京大学学报》

刘 曙 光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摇摇黄枬森先生无疑是北京大学的骄傲。他不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骄傲,也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骄傲。先生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已广为大家所熟知。可是,对先生与《北京大学学报》的渊源或许知之者并不多。在近 60 年的时间里,先生与《北京大学学报》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三重身份:读者、作者和编者”,他与学报是“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成长和前进的”。① 作为作者,他以精品力作为学报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作为编者,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为学报排忧解难、掌舵导航。先生走了,但他以自己一生的心血,用学术和学报,为自己建造了两座丰碑。

一

先生说,从《学报》诞生之日起,自己就是它的忠实读者,不断地从中获取所需的各种新鲜的学术信息;从《学报》诞生之日起,自己就成了它的坚定的作者。的确,先生经常给学报惠赐名篇佳作,为学报增光添彩。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文革”十年外,先生每年都会在学报发表一篇文章,有的年份甚至是两篇。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可谓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窥见先生和《学报》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近六十年来所共同走过的学术足迹,可以感受到先生“思维之活跃”与“用力之勤”;分析这些文章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真正体味到先生的“治学之宽”和“功力之深”。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虽然六十多年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他决不囿于一门一派,而是强调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融会贯通和综合创新。这种学术追求,不仅从他自己发表在《学报》上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而且,还表现在他与其他各领域的学者联系非常紧密,表现在他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总是吸纳研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学者参加②。或许,这与他早年所接受的中国传统

① 黄枬森:《同呼吸共命运的五十年》,《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② 黄先生总是谦虚地说:“我所获得的学术成果,都是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与学者们在共同讨论(包括争论)、互相切磋、密切合作中做出的,都是集体的成果。”参见黄枬森:《我和哲学》(2012 年 12 月 27 日未完稿)。